

中國考古文集

苏秉琦題



华北卷

新石器(二)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东亚文库

中国考古学集萃

苏秉琦题



华北卷

北京市
河北省
天津市
山西省

新石器(二)

k87-53
2012.2
6

哈尔滨出版社

《中国考古集成》华北卷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主 编 孙进己 苏天钧 孙 海

常务副主编 薛新建 孙 泓

副 主 编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绵厚 冯永谦 齐 心 张畅耕 郑绍宗 韩嘉谷

编 者

综 述(一)	孙 海	王 雷	张春霞
综 述(二)	孙 海	贺 平	王 雷
旧石器(一)	孙 海	张春霞	
旧石器(二)	孙 海	贺 平	
新石器(一)	李晓钟	薛新建	
新石器(二)	薛新建	李晓钟	
商 周(一)	薛新建	刘 宁	
商 周(二)	薛新建	刘 宁	
商 周(三)	刘 宁	薛新建	
战国秦汉(一)	孙 泓	任俊岩	
战国秦汉(二)	孙 泓	张春霞	李 威
战国秦汉(三)	孙 泓	任俊岩	
魏晋至隋唐(一)	孙 泓	张春霞	李 威
魏晋至隋唐(二)	孙 泓	张春霞	
宋 辽(一)	姚义田	袁 辉	
宋 辽(二)	贺 平	姚义田	
金 元(一)	申国俭	刘焕民	
金 元(二)	刘焕民	申国俭	
明 清(一)	阎中发	贺 平	孙琥珀
明 清(二)	孙 海	阎中发	黎凤春

《东亚文库》编委会

主 编 孙进己

副 主 编 黄凤岐 冯永谦 干志耿 苏天钧

孙 海 孙 泓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干志耿 王 雷 王宏刚 王绵厚 冯永谦 孙 泓 孙 海 孙进己

齐 心 刘永智 苏天钧 刘国有 吴文衡 李品清 李之勤 李英魁

李逸友 李殿福 张志立 张泰湘 崔 灿 孟广耀 周光培 周伟洲

郑绍宗 徐德源 黄凤岐 朝 鲁 蒋秀松 魏国忠 穆鸿利

编辑部主任 孙 泓

校 对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 剑 刘 娴 孙月辉 张晶晶 邹德兰 姜 伟 倪文华 赵锦红

徐 坤 郭妍萍 康欣瑞 黎凤春

《中国考古集成》编委会

名誉主编 苏秉琦

顾问 佟柱臣 张忠培 朱子方 干志耿 孙守道 李逸友

主 编 孙进己 苏天钧 孙 海

常务副主编 蔺新建 孙 泓

副 主 编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绵厚 冯永谦 齐 心 张畅耕 郑绍宗 韩嘉谷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干志耿 王 侠 王武钰 王绵厚 尹学伟 云希正 田淑华 宁立新

冯永谦 孙 泓 孙 海 孙进己 齐 心 朱德威 刘世枢 刘建忠

苏天钧 张庆捷 张志立 张畅耕 张春霞 李经汉 杨新平 杨富斗

贺 平 赵福生 高 可 阎中发 姚义田 唐云明 黄凤岐 陶富海

韩嘉谷 蔺新建

目 录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首次发现铜器	张岱海(661)
龙山文化陶寺类型的年代与分期	高天麟 张岱海 高 炜(665)
论龙山文化土窑洞的分期	傅淑敏(674)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陶片的测试和分析	李敏生 黄素英(686)
龙山文化陶寺类型农业发展状况初探	高天麟(696)
陶寺遗址及邻近地区考古地磁研究	张维玺(703)
陶寺遗存可能是陶唐氏文化遗存	王文清(711)
再论夏文化问题——关于陶寺龙山文化的探讨	黄石林(719)
陶寺考古发现对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意义	高 炜(730)
《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读后	朱延平(739)
陶臼的发现及研究	郭 仁(743)
翼城四遗址调查报告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744)
山西翼城枣园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调查报告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749)
太原、垣曲两处史前瓮棺墓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760)
山西大同及偏关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	戴向明(763)
山西垣曲古文化遗址的调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768)
山西闻喜古文化遗址调查简报	张国维(776)
山西定襄县西社村龙山文化遗址调查	山西省博物馆(782)
山西祁县梁村仰韶文化遗址调查简报	杨富斗 赵 岐(786)
温家沟和左北遗址的调查	丁建平(787)
山西洪洞县耿壁、侯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	丁建平 马安柱 陈哲英(789)
山西右玉丁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存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右玉县图书馆(792)
雁北三处史前遗址之调查	裴文中(794)
山西平陆县西侯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	王志敏(798)
太原义井村遗址清理简报	代尊德(801)
山西娄烦、离石、柳林三县考古调查	卜 工 陈冰白 许 伟(805)
山西闻喜汀店新石器及周代遗址	邓林秀 丁来普(813)
山西汾阳县峪道河遗址调查	王克林 海金乐(815)
山西省侯马市上北平望遗址调查简报	侯马市博物馆(819)
山西广灵县洗马庄石器遗存	陈哲英(822)
丁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范围内的新石器文化遗存	临汾地区丁村文化工作站(828)

大同云冈附近的新石器时代遗存	安志敏(837)
太原东太堡出土的陶器和石器	郭淑英(841)
西阴村史前遗存第二次发掘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844)
对西阴村遗址再次发掘的思考	杨富斗(895)
山西河津固镇遗址发掘报告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898)
洪洞侯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试掘报告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洪洞县博物馆(949)
山西翼城北撖遗址发掘报告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973)
山西省垣曲县古城东关遗址Ⅳ区仰韶早期遗存的新发现	许志勇(1016)
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	高 炜 李健民(1026)
山西曲沃东许遗址调查、发掘报告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曲沃县博物馆(1040)
山西翼城南石遗址调查、试掘报告	海金乐 薛新民(1060)
山西洪洞耿壁遗址调查、试掘报告	王万辉 薛新民(1072)
垣曲古城东关遗址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	张素琳 佟伟华(1083)
山西平陆新石器时代遗址复查试掘简报	蒋忠义 阳吉昌(1125)
山西芮城南礼教村遗址发掘简报	陈存洗(1129)
山西太谷白燕遗址第一地点发掘简报	许 伟 杨建华(1138)
山西太谷白燕遗址第二、三、四地点发掘简报	杨建华 许 伟(1157)
山西垣曲龙王崖遗址的两次发掘	张岱海(1167)
山西汾阳孝义两县考古调查和杏花村遗址的发掘	陈冰白 卜 工 许 伟(1182)
山西侯马东呈王新石器时代遗址	王万辉 薛新明 孔富安 胡 建(1189)
山西襄汾陈郭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与墓葬发掘简报	王万辉 薛新民 田建文(1204)
山西省襄汾县丁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	马 升(1209)
山西芮城东庄村和西王村遗址的发掘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1218)
1982—1984年山西垣曲古城东关遗址发掘简报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垣曲县博物馆(1272)
山西长治小神村遗址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晋东南工作站(1285)
山西大同马家小村新石器时代遗址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大同市博物馆(1291)
大同马家小村遗存分析	海金乐(1300)
山西天镇县楼子町发现细石器	陈哲英 吴永春(1306)
山西大同高山镇之细石器	陈哲英 王清诗 解廷琦(1309)
山西怀仁窑子头的细石器遗存	陈哲英 丁来普(1317)
山西应县边耀的细石器	陈哲英 丁建平 张永权(1323)
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岩画辨疑	叶茂林(1326)
太原狄村、东太堡出土的陶器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329)
山西侯马发现四千年前大型谷仓	田建文(1335)
河津县固镇新石器时代遗址	海金乐(1336)
翼城县枣园新石器时代遗址	田建文(1337)
五台县阳白新石器时代遗址	贾志强(1338)
大同马家小村新石器时代遗址	海金乐(1339)
襄汾县丁村曲舌头新石器时代遗址	胡 建(1340)
榆社常家坪新石器时代遗址	石 众 王太明(1341)
武乡、左权县新石器时代和周代遗存	马 升 薛新明(1342)
长治市小神村新石器时代遗址	宋建忠(1343)

曲沃县东许新石器时代遗址	海金乐	蒋新明(1344)
曲沃县方城新石器时代遗址		赵慧民(1345)
侯马市东呈王新石器时代遗址		(1346)
沁源县花坡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		朱晓东(1347)
滹沱河流域考古调查与试掘		侯毅(1348)
忻州市游邀新石器时代遗址		马升(1349)
山西闻喜县发现龙山时期大石磬	李裕群	韩梦如(1350)
义井遗址调查所见		范英杰(1352)
山西汾城县连村、史村的古遗址		(1353)
山西文水县发现古遗址及摩崖造像		酒冠五(1354)
平鲁县王高登发现古文化遗址		边成修(1355)
壶关海头村发现古代文化遗址		王玉山(1356)
山西省绛县周家庄发现古代文化遗址		李奉山(1357)
山西大原市郊区发现古代文化灰层	戴尊德	曾广亮(1358)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雁北忻县两专区发现古代遗址		郭勇(1359)
山西曲沃县发现古代遗址		酒冠五(1360)
云冈附近发现的古代陶片		王伯敏(1361)
山西垣曲下马村发现新石器时代陶器	代尊德	邓林秀(1362)
山西壶关文物普查组发现古遗址三处		刘权(1365)
山西稷山、永济、芮城发现彩陶遗址	酒冠五	张来瑞 王寄生(1366)
山西襄汾大崮堆山发现新石器时代石磬坯		陶富海(1367)
山西省文管会重点调查汾城县古代遗址	张德光	李奉山(13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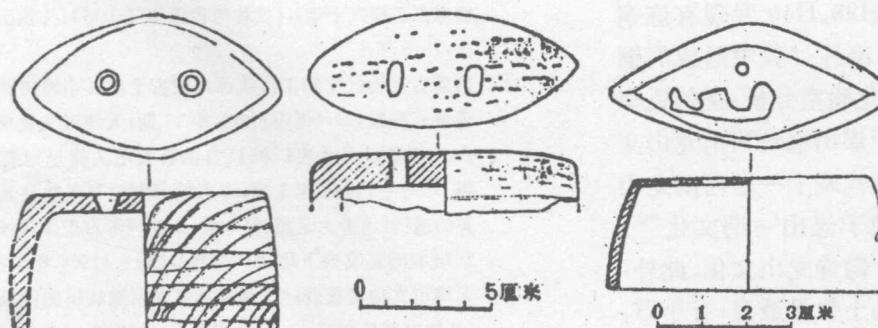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首次发现铜器

张岱海

1983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在M3296号墓中，首次发现一件铜器。

M3296 位于陶寺遗址东南隅、陶寺墓地第三发掘区、探方T3112的东南角。开口在第二层（近、现代扰土层）下。墓呈长方形，土圹竖穴。墓口中线长215厘米，宽65~80厘米，头端略小，墓深220厘米。方向115°，无葬具。墓底埋葬骨架一具，保存较好，仰身直肢，面部向上微偏左侧。经鉴定，系男性，年龄在五十岁以上（图版壹，1）。

在骨架左侧股骨与趾骨联合之间，随葬铜器一件（图版壹，4）。铜器外面有很清晰的布纹痕迹，可能在埋葬时包裹有丝麻织物。器表素面，器体横断面近似菱形，口部较大，长对角线6.3厘米，另两角呈圆弧形，对角线长2.7厘米。顶部略小，长对角线5.2、短对角线2.1、器高2.65厘米。顶部中间有一圆形小孔，位置略偏一侧，孔径约0.25厘米，经仔细观察，孔系整器铸成后再加工钻成。器胎不很匀称，周壁厚约0.28厘米，顶部较薄，厚约0.17厘米。顶部和器壁各有一处不规则形的残痕和透孔，系浇铸过程中出现的缺陷（图版壹，2、3；图一，右）。整体造型近似铃形。确切用途不详。



图一 左：铃形铜器（采集） 中：铃形陶器(H340:51) 右：铃形陶器

铜器经考古研究所化验室进行化学定量分析，得知其含铜量为97.86%、铅1.54%、锌0.16%，系纯度较高的红铜（详见附录《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铜器成份报告》）。

陶寺墓地已揭露的面积将近5,000平方米，第二层下除发现有极个别的汉代遗迹和零星的金、元时期的墓葬外，都是陶寺类型龙山文化的遗迹。已清理的陶寺类型墓葬有一千多座，基本特点是：墓坑呈长方形、土圹竖穴；一些中型墓和大多数小型墓无木质葬具；基本上都是仰身直肢、成年单人葬；头向东南；中、小型墓绝大多数不用陶器随葬。在这些方面，M3296与陶寺龙山文化墓地中其它墓葬是一致的。这座墓的长、宽度和深度，也是陶寺龙山文化墓葬习见的。相反，在墓葬形制、葬具、葬式、头向以及随葬器物等方面，与几座汉代以后的墓葬判然有别。纵然M3296没有地层关系和随葬陶器可以借鉴，仍是可以肯定为龙山文化陶寺类型的墓葬。这一点，从墓葬的排列情况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明。

M3296的人骨经C¹⁴测定(ZK1314)，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3835±130年(1885B·C·)。

根据本所实验室对陶寺龙山文化人骨的C¹³测定和研究，认为当时居民以小米为主食。因此，人骨的C¹⁴年代经同位素分馏效应校正应相应增加200年左右。M3296人骨的C¹⁴（树轮校正）年代增加200

年的校正值之后，应为公元前 2085 年左右，即公元前二十一世纪上半叶。

依据已测的一系列 C¹⁴年代数据，陶寺遗址和墓地的年代范围为公元前二十五、二十六世纪至前二十世纪^①。M3296 人骨经过同位素分馏效应校正后的 C¹⁴年代，显然包括在上述年代范围之内，这就使这座墓葬和所出铜器的时代得到了确证。

另外，在陶寺遗址曾经发现两件与铃形铜器造型相似的陶制品，均泥质陶、手制，横断面呈菱形，顶部有两个小孔。一件出自居住区第三发掘区早期灰坑 H340 中，标本 H340:51，口部残缺，器表黑色兼呈灰褐色，陶胎红褐色顶部饰不很清晰的绳纹，顶周有一道不规整的凹弦纹，两孔系烧制前做成，呈长圆形。顶部长对角线 10、短对角线 3.8 厘米(图一，中)。采集一件，灰陶，一侧刻划出六道弦纹又多道弧线，组成不规整的方格纹，另一侧刻道浅、乱、稀疏。顶部两孔亦是烧制前做成。顶部长对角线 9.1、短对角线 4.8 厘米，口部长对角线 10.1、短对角线 3.8、器高 5.4 厘米(图一，左)。两件陶制品略大于铜器，但造型特征基本一样。据此，可以认为铃形陶器的出现，为 M3296 铃形铜器的时代提供了佐证。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断定 M3296 出土的铃形铜器，是属于中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的遗物，时代当不会晚于陶寺晚期，应是公元前两千年以前龙山文化时期的红铜铸造器。

陶寺墓地铜器的出土，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发现。铜器的出现和使用，是社会生产力飞跃发展的标志，或许在我国确曾有过使用红铜的“金石并用”时代，尽管很快为青铜所取代，但它却是首开纪元。解放以来，出土早期铜器见于正式报导并为学术界所公认的，在中原地区，河南临汝煤山遗址二期(河南龙山文化)遗存 H28、H40 发现有炼铜坩埚残片，内壁保留有多层冶炼过程中形成的铜液凝固残迹，经考古研究所化验室分析，铜的近似值为 95%，属于红铜^②。关于煤山遗址河南龙山文化的时代，“第一期文化的时代晚于一般河南龙山文化”，“煤山二期的年代晚于煤山一期文化”^③。可知其相对时代当不会早于陶寺龙山文化。此外，以西北地区齐家文化遗址出土数量最多，有小刀、匕首、锥、凿、磷、斧、镜、指环等^④；其次是北方长城沿线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器形有小刀、簇、

指环、耳环等^⑤。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器形小而简单，都以小刀多见，未见容器；凡经鉴定分析者，多是红铜，青铜很少；制法多系冷锻加工，范铸较少，合范更少。它们的时代，前者大体与陶寺遗址出土的铜器相当或略晚，后者无疑更晚。

另外，二里头遗址三、四期也曾出土多件铜器，包括工具、兵器、装饰品以及多范合铸的容器，绝大多数属于典型的青铜^⑥。还有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第四层(东下冯类型文化层)出土的铜簇、铜凿以及铸铜斧的石范等^⑦。它们都应属于早商文化范畴，铜的冶炼技术和铜器的铸造工艺都比陶寺龙山文化有明显的进步，自然是可以理解的。

陶寺遗址的红铜铸造器，虽不是容器，但铸造方法已达到了可以铸造容器的高度，铜的纯度也比较高，将近 98%。我们从冶炼和铸造铜器的技术水平，可以看出当时的冶金铸造工艺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这件铜器的出土，对于探讨我国青铜器的起源和发展、研究冶金铸造史，都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同时，对于探讨中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的文化面貌、揭示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注：

- ① 高炜、高天麟、张岱海：《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 年 6 期。
- ②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2 年 4 期。
- ④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 年 2 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 年 2 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75 年 2 期；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 年 4 期；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 年。
- ⑤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宁城县小榆树林子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65 年 12 期；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坨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6 年 1 期；安志敏：《唐山石板墓及其相关的遗物》，《考古学报》第 7 册；琉璃河考古工作队：《北京琉璃河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考古》1976 年 1 期；天津市文物管理处：《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一)，文物出版社，1977 年。
- ⑥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1959 年河南偃师二里头试掘简报》，《考古》1961 年 2 期；中国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4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八区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5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年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1980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河南偃师二里头二号宫殿遗址》,《考古》1983年3期。

- ⑦ 东下冯考古队:《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东区、中区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2期。

附录: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 出土铜器成份报告

1984年1月,考古所山西工作队提供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早期铜器一件,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做了成份测定,现将测定结果报告如下:

1. 样品描述

样品呈铃形状,表面为一层绿锈覆盖。其横截面呈菱形,上部长5.2厘米,最宽处2.1厘米;下口长6.3厘米,最宽处2.7厘米。纵剖面呈梯形,高为2.65厘米。两侧和上部有铸造缺陷和气孔。厚度0.17~0.28毫米。

2. 测定方法

铜样品先经光谱定性测定,除含有大量铜外,尚含有微量铅、砷、锑、铋、镍及银等。继后又进行铜、锡、铅、锌和铁的定量测定。

将铜样品去锈钻孔取样,加适量硝酸加热溶

解,其中锡形成偏锡酸沉淀,过滤分离,将偏锡酸沉淀加少许等量硝酸和硫酸溶解,移入容量瓶中。取整份部分,加过量EDTA,以二苯酚橙为指示剂,用醋酸锌进行返滴定,得锡量。

将提去偏锡酸的滤液移入容量瓶中,取整份部分,加氯化氢钾隐蔽铁,以淀粉为指示剂,用硫代硫酸钠进行滴定,得铜量。尔后在同一溶液中加三氯化铝解蔽铁,用硫代硫酸钠进行滴定,得铁量。再取部分溶液,依上法用碘量法滴定铜后,在同一溶液中加氯化钾作隐蔽剂,以EDTA滴定得铅量。再以甲醛解蔽锌,EDTA滴定得锌量。

3. 测定结果

Cu%	Pb%	Zn%	Fe%	Sn%	总和
97.86	1.54	0.16	/	/	99.56

分析结果表明,该铜器成份是纯度达98%的纯铜。铅、锌为混入的杂质。纯铜质软性脆,呈红色,又称红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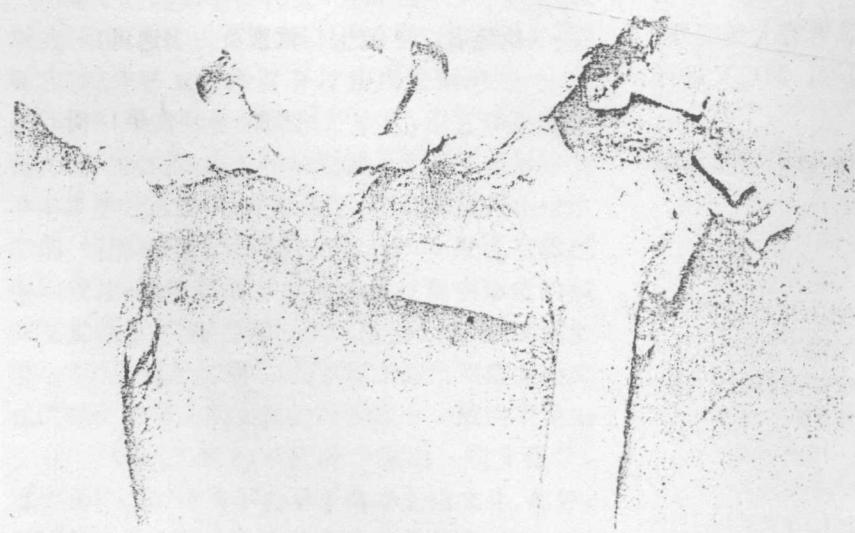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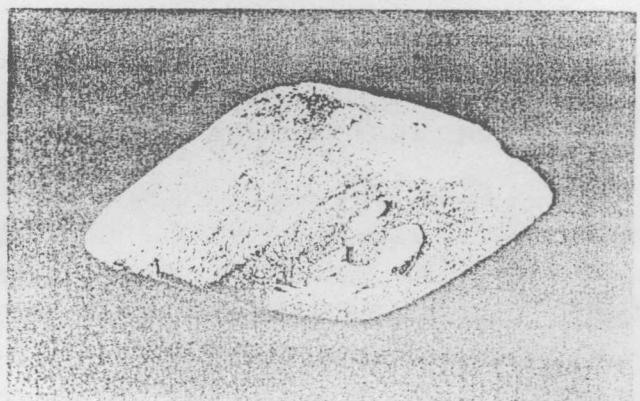
铜器两侧边沿及上部的缺陷,是由于纯铜铸液流动性差,又在冷却时收缩性大,易吸收气体所导致的铸件缺陷和多孔性。

商代以前的红铜器,出土不多。已公开发表的,除黄河上游甘肃齐家文化遗址出土几件红铜小件,如刀、锥等外,还有河北唐山大城山龙山文化遗址的两件红铜牌,但多为冷锻法制成。

中国早期铜器的发展,特别是有无使用红铜器的金石并用时代,尚无定论。陶寺遗址红铜铸器的出土,为探索铜器起源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执笔者 李敏生 黄素英 季连琪)

考古 1984年12期



1. M3296 墓室 2. 铃形铜器 3. 铃形铜器 4. 墓室局部(铜铃位置)

龙山文化陶寺类型的年代与分期

高天麟 张岱海 高 炜

早在五十年代，龙山文化陶寺类型的遗址已有所发现^①。

六十年代初，围绕探索夏文化的学术任务，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沿汾河下游及其支流浍河、滏河流域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这一带的龙山文化以釜灶、夹砂陶缸、矮足鼎、直口肥足鬲、篮纹圈足罐、扁壶等为代表的器物群，别具特征，其文化面貌不但与豫西、豫中等地的“河南龙山文化”或关中的“客省庄二期文化”有所不同，与晋南涑水流域的龙山文化遗存亦有明显区别。当时就曾认为，这种遗存应属于龙山文化的另一类型，其分布地域与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大体以峨嵋岭为界，南北相邻。经过七十年代的补充调查和重点复查，以及先后对翼城、曲沃两县交界处的开化遗址（翼城县开化村和开化西沟附近）和方城——南石遗址（曲沃县方城村北、翼城县南石村、古巨村四周）进行试掘，对这类遗存有了更多一些的了解。

1978年以来，对襄汾县陶寺遗址进行了有计划的发掘。我们曾提出，以陶寺遗址为代表的这类遗存，“从总的方面来看，仍属龙山文化范畴，但同时又有自身的特点”，应属于中原地区（黄河中游）龙山文化的一个地方变体，并建议命名为“陶寺类型”^②。在后来的田野工作实践中，使我们的上述认识进一步得到深化，而陶寺墓地的发掘材料^③，对于揭示陶寺类型的文化性质和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尤具典型意义。

据目前所知，陶寺类型遗址主要分布于临汾盆地。沿汾河下游和浍河流域，在临汾、襄汾、侯马、新绛、稷山、河津、曲沃、翼城、绛县等县（市），已发现这一类型遗址七十余处。遗址分布比较密

集，有的地点是与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东下冯类型文化共存。相对来说，遗址面积比较大，例如，陶寺、开化、方城——南石等三处，都是一百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遗址，它们分别座落在崇山的西麓或东南麓。在这一带，还有一批面积在十万平方米左右的陶寺类型文化遗址。就已调查过的地区来看，崇山周围的汾、浍三角地带应是陶寺类型分布的中心区。

历年来的成果，主要是陶寺遗址的发掘，使我们现在有可能对陶寺类型的年代、分期序列以及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陶寺遗址的分期

（一）分期的标准和依据

陶寺遗址目前分为早、中、晚三期，主要是以第Ⅳ发掘区的文化层堆积为依据。Ⅳ区的堆积情况，可以T401为例^④简述如下：

第1层 农耕土。

第2层 近、现代扰乱层。

第3层 汉代文化层，出土五铢钱和铭刻陶文的盆、瓮等残片。

第4层及4A、4B、4C三小层 陶寺晚期文化层，出土直口肥足鬲、细密竖篮纹的扁壶、折肩罐、镂孔圈足罐、深腹盆等特征明显的晚期器物。从第4层下的陶窑Y402打破4B层下的房子F401等现象，可看出晚期堆积的形成时间并不短。

4D—4F层 陶寺中期文化层，直接叠压在4C层和F401下面。同时期的灰坑有H412、

H413、H416 和 H420 等,出土釜灶,釜呈翻沿盆形,口部多磨光、夹砂陶缸、侈口深腹平裆鬲、绳纹或大方格纹扁壶等器物。鬲和釜灶共存,是中期最明显的特点之一。从器类、器形和纹饰特征看,都具有早、晚之间的过渡性质。

第5层 陶寺早期文化层,出土大量绳纹釜灶残片以及夹砂陶缸、矮足鼎、敞口平底盆、双簋在颈部的绳纹扁壶、磨光黑陶的大型平底瓮、罐等,但决然不见陶鬲。

1. 早期

(1) 遗迹 早期的房子有半地穴式和窖洞两种。窖洞的顶部多已坍塌,壁面向上作弧形内收。其室内面积和平面形状同半地穴式房子相仿,均多呈圆角方形,长、宽一般在2—3米。两者在结构上也有一些相同之处,例如:室内地面为硬土地面或白灰面。有的房子经过两次利用,先是硬土地面,后来又补修为白灰地面。地面中央或偏一侧设置灶坑或烧面,还有的在一侧筑有灶台。壁面上常掏出壁龛或小窑,等等。

早期灰坑有圆形、圆形袋状、椭圆形、不规则形等几种,坑的容积一般较大,坑口直径多在2米以上,深度多在2—3米,也有深达5—6米者。

水井作圆形,口径在3米以上,深13—15米,底部呈锅底状,近底部保存有残高1.6米的木构痕迹。木构系圆木搭叠,平面近方框形。井底沉积着大量的扁壶碎片。

墓葬都是土坑竖穴墓。大型墓长2.90—3.20、宽2—2.75、残深0.70—2.10米不等。使用棺木,棺内铺垫砾砂,随葬成套的彩绘木器,彩绘陶器,玉、石器,猪骨架以及鼍鼓、特磬等;中型墓有两种:一种墓坑比较深,一般长2.29—2.50、宽0.80—1.00、坑深2—3.55米;一种墓坑浅宽,一般长2.00—2.50、宽1.00—1.58米,坑深数十厘米至一米上下不等。大都使用木棺,棺内施砾砂,随葬玉、石器、猪下颚骨,少数有陶器或彩绘陶器、彩绘木器;小型墓一般长2米上下,宽0.40—0.60、深0.50—1米,少数墓有骨笄或猪下颚骨1—3件,绝大多数没有葬具和随葬品。

(2) 生产工具及武器 由石、骨、蚌、陶质原料制成,以石质工具居多,器形有石斧、铲、锛、刀、镢、研磨盘、研磨棒、曲尺形石器等。石斧的形式较多,斧身长度从六、七厘米至三、四十厘米不等,在

墓中大、小成组出现。石铲多作长方形或梯形,双面刃,铲身上端往往留有捆绑装柄痕迹。长方形扁平石锛,单面刃,多数通体磨光,M3002中曾出土长、广尺寸依次排列的一组13枚石锛,当是一套很精细的木工工具。刀,有扁平长方形穿孔石刀和梭形弧刃穿孔石刀两种。墓中“V”字形大型石刀,虽属厨刀性质,与生产工具无涉,但其形制特殊,为中原地区所罕见。石镢以薄片三角形无铤镢最多,其次有镢身作三棱形、阔叶形的圆铤镢。曲尺形薄片石器,长边和短边都磨出锋刃,当属一种复合工具的刃部,也是陶寺类型富有代表性的工具之一。此外,尚有骨铲、骨镢、骨针和陶垫等。在灰坑壁上遗留有石铲和木耒的痕迹。

(3) 陶器 陶器的质料主要是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两大类,此外还有少量的夹砂褐陶、泥质褐陶和泥质黑陶。制法基本上是手制(泥条盘筑法),轮制者少见。陶胎较粗厚。多平底器,圈足器很少,三足器仅有斝和鼎。器腹多作直壁或斜直壁,缺乏圆鼓腹等器体浑圆的造型。一些陶器的腹部虽略向外鼓突,但在鼓突部位往往施泥条、泥饼或泥釆,用以加固。陶器表面都先经过拍打,素面或磨光陶器也常常是先拍绳纹,然后抹平或磨光,盆、盘、豆等多是外施绳纹,内壁磨光。某些磨光黑陶有表皮脱落的现象,从而得知其陶胎表面曾施一层黑色陶衣。器表以饰绳纹者为大宗,其次是素面或磨光,附加堆纹、篮纹、弦纹、方格纹均很少见(表一)。附加堆纹多呈环带状施于陶缸、釜灶、鼎、斝的器表。篮纹作不规则的粗斜条。烧成温度偏低,陶色多不纯正,甚至一件器物上往往色调不一,反映出烧制技术尚欠成熟。

按用途分,炊器有:釜灶、灶、斝、鼎、矮足鼎、夹砂缸、夹砂罐、甑等,其中以釜灶、斝、缸多见。釜灶是由一直口圜底罐形釜与一桶状灶圈上下套接而成。釜外附对称鋬手,有的并在釜内设有箅架。斝的式样很多,有深腹圜底盆形斝、薄胎折腹盆形斝、单耳罐形斝等。陶缸器形较大,多夹粗砂,腹壁近直,口、底直径相若,故习惯呼之为“直壁缸”。出土时,缸的腹、底常贴附着烧泥。盛器有:大口罐和瓮、小口高领折肩罐、小口圆肩瓮、高领折肩瓶和壺、折腹盆、深腹盆、敞口平底盆等。大型瓮、罐多上部磨光,下施绳纹,腹部外鼓部位附有菌状泥饼或贯耳。墓中的小口高领折肩罐,喇叭口上附有丝

表一

陶寺遗址各期陶器的陶质和纹饰统计表

早 期			中 期			晚 期		
H439 H1102 F408			H412、H420、F402、F407			H302、H402、H1101		
陶质%	纹 饰%		陶质%	纹 饰%		陶质%	纹 饰%	
夹砂灰陶 56.58	绳纹	53.7	夹砂灰陶 66.72	绳纹	65.86	夹砂灰陶 31.65	绳纹	30.23
	素面	1.97		素面	0.3		素面	0.47
	附加堆纹	0.89		附加堆纹	0.57		附加堆纹	0.3
	方格纹	0.02		方格纹			方格纹	0.65
泥质灰陶 22.97	绳纹	17.7	泥质灰陶 27.53	绳纹	22.67	泥质灰陶 60.76	绳纹	24.61
	素面	5.02		素面	3.92		素面	8.04
	篮纹	0.22		篮纹	0.89		篮纹	26.71
	弦纹	0.03		弦纹			弦纹	0.56
	方格纹			方格纹	0.04		方格纹	0.81
	附加堆纹			附加堆纹			附加堆纹	0.03
夹砂褐陶 10.43	绳纹	10.18	夹砂褐陶 0.68	绳纹	0.48	夹砂褐陶 1.39	绳纹	1.38
	素面	0.18		素面	0.14		素面	
	附加堆纹	0.07		附加堆纹	0.04		附加堆纹	0.01
	篮纹			篮纹	0.02		篮纹	
泥质褐陶 6.17	绳纹	4.87	泥质褐陶 2.87	绳纹	2.56	泥质褐陶 3.74	绳纹	2.26
	素面	1.19		素面	0.3		素面	1.14
	弦纹	0.1		弦纹			弦纹	0.05
	篮纹			篮纹	0.01		篮纹	0.26
	方格纹			方格纹			方格纹	0.03
泥质黑陶 3.85	素面	3.84	泥质黑陶 2.2	素面	2.2	泥质黑陶 2.05	素面	2.00
	划纹	0.02		划纹			划纹	
	弦纹			弦纹			弦纹	0.05
						泥质红陶 0.39	绳纹	0.02
							素面	0.01
							篮纹	0.36
总 计 100%			总 计 100%			夹砂红陶 0.02	夹砂红陶	0.02
	绳纹	86.45		绳纹	91.57		绳纹	58.52
	篮纹	0.22		篮纹	0.92		篮纹	27.33
	素面	12.20		素面	6.86		素面	11.66
	附加堆纹	0.96		附加堆纹	0.61		附加堆纹	0.34
	方格纹	0.02		方格纹	0.04		方格纹	1.49
	弦纹	0.13		弦纹			弦纹	0.66
	划纹	0.02		划纹			划纹	

帛遗痕，或系盛酒器。食器有：盘、豆、碗、钵等。豆分高把、矮把两种，皆浅盘，盘内磨光，外施绳纹。饮器有：觚和单把杯。汲水器扁壶，发现数量很多，也是这个遗址最富代表性的器物之一（图一）。

早期大型墓的随葬器物组合，通常是灶一件，

深腹斝、折腹斝、单耳罐形斝各一件。平砂大口罐、单把罐各一件，泥质大口罐二至五件，小口折肩罐二件，折腹罐一件，彩绘高领折肩陶壶二件，彩绘折腹陶盆一件，彩绘蟠龙陶盘一件，豆数件至十数件。凡泥质器往往在口沿或肩部涂朱，或在腹部绘

三、四个朱红色大圆点。中型墓的随葬陶器有鼎、斝、彩绘折腹盆、单耳罐各一件，有的只有彩绘陶瓶一件。小型墓则一般没有陶器。

2. 中期

(1) 遗迹 中期的半地穴式房子与早期相似，平面呈圆形、圆角方形或茧形，有白灰面和烧土地面两种。房内亦多掏小龛或窑洞。一部分房子的室内中央有柱洞。

灰坑的形状同于早期，只是出现了灰坑中埋人的情况，单人骨架，仰身直肢。

发现同时期相邻的四座陶窖，都是竖穴窖，分火膛、火门、火道、窖室四部分。Y405 的窖室南北长 1.44、东西宽 1.2 米，有六股火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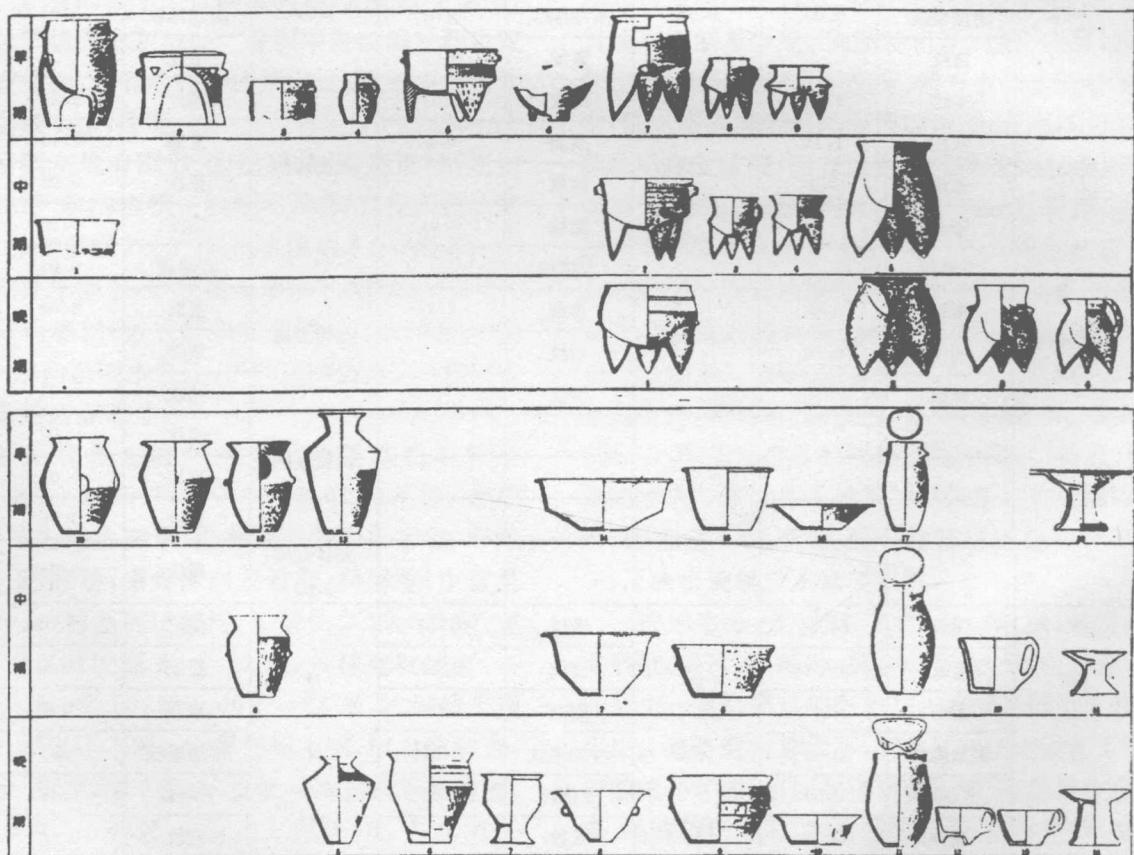
墓葬形制与早期相似。

(2) 生产工具 与早期区别不大，陶窖和灰坑

壁所见工具痕迹亦与早期一致。

(3) 卜骨 中期始见，多为猪的肩胛骨，未经整治，仅有灼点，不凿不钻。

(4) 陶器 中期陶器仍以手制为主，兼用模制，轮制尚少。褐色陶的比例有所下降，陶色纯正的灰陶比例有所增长。在各种纹饰中，绳纹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印痕较早期深而细密。篮纹由排列均匀、整齐的宽行竖篮纹代替早期的斜篮纹，变化较为明显。从出土数量看，釜灶、夹砂缸和矮足鼎趋于衰落。釜灶多作翻沿盆形，器壁变薄，近口部多加磨光。斝仍有大、中、小三种，大者作腹部满饰附加堆纹的浅腹盆形，中者喇叭口、折腹、作圜底尊形，小者仍为单耳罐形。扁壶腹部扁平的一侧较早期明显，颈、腹分明，双鋬移至口沿，器表饰绳纹或粗大方格纹。折腹盆器形变高，上腹略斜收，底开



图一 陶寺遗址陶器分期图

早期: 1. T1:3B:3 2. M3015:28 3. H103:7 4. M3015:45 5. M2053:4 6. T1:3B:11 7. M3002:32 8. M1111:4 9. M3002:2

10. H4:24 11. H4:21 12. M3016:7 13. M3002:10 14. H4:28 15. H438 16. H1102 17. H4:26 18. M3073:14

中期: 1. H420 2. M2027:8 3. M2035:4 4. M2027:2 5. 采集 6. M2035:17 7. H2009:6 8. H430:4 9. H412 10. H412
11. M2035:19

晚期: 1. H303:13 2. H303:12 3. T404:4:11 4. H1101:35 5. H1101 6. H303:14 7. H303:18 8. H303:17 9. H428:101
10. T404:4:6 11. H303:16 12. H303:20 13. H303:21 14. H301:4

始变小，与晚期双腹盆造型接近。最明显的标志是鬲的出现。中期的鬲有两种：一种灰褐色，陶胎较厚，作宽沿外翻的深腹圜底罐形，平裆，沿外附加泥条，沿下施对称鋬；一种陶胎略薄，束颈，尖裆，器形与晚期单把鬲接近（图一）。

中期大、中型墓葬随葬陶器组合与早期近似。大型墓为灶一件、斝二件，夹砂单耳罐一件，泥质大口罐二件，高领罐一件，折腹罐一件，彩绘瓶一件或彩绘壶二件，彩绘折腹盆一件，豆五件、中型墓常见斝一至三件，灰陶大口罐二件，彩绘瓶、彩绘折腹盆、单耳罐、双耳罐或折腹罐等各一件，豆数件。

3. 晚期

(1) 遗迹 除继续使用半地穴式房子外，晚期出现地面上的白灰面房子（F401），室内平面仍作圆角方形，门道略外凸，室内正中有灶坑。这座房子也是两次使用，第一次系硬土地面，然后填土砸实，抹草泥土，再用白灰涂地面和墙裙。

晚期多见大型灰坑，包含物较丰富，个别灰坑内也有埋人现象，仍作单人仰身直肢葬式。

同时期的陶窑，有的三座相邻。以Y402为例，整体呈葫芦状，前为火膛，火膛后部有斜坡火道通往窑室，窑室扁圆，南北1.02米、东西1.42米，有主火道三条，两侧又各有一条支火道。窑前有操作面。

水井（H428）的形制、口径、深度与早期水井相若，只是井内木构略有差别，主要是增加了立柱。木构从井底起算残高3米，四面各有立木二至五根，四周又有多层横木与之相交，形成一个近方形的木框结构。

尚未发现晚期大型墓，中、小型墓的墓坑形制与早、中期相似。在几座深坑中型墓中，木棺的结构相当复杂，底板下使用垫木，四角立有圆柱，前、后挡板及左、右壁板嵌入四柱的榫槽中，底板、盖板与四柱之间也用榫卯相合。

(2) 生产工具与武器 石器中出现有肩石铲。骨、蚌器尤其是骨镞的数量明显增加，骨镞有三棱形和柳叶形两种。陶垫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圆锥形、方形、长圆形、多中心穿孔，其他工具变化不明显。

(3) 陶器 晚期陶器中，灰陶同中期一样占到百分之九十以上，但夹砂灰陶的比例相对下降，泥质灰陶的比例相应提高。另有少量的泥质磨光黑

陶、泥质褐陶和夹砂褐陶，红陶的数量极少。制法有轮制、模制和手制。泥质陶器多用轮制，如簋、圈足罐、单耳罐、单把杯等。三足器系手、模合制，袋足内壁往往见到反绳纹或反方格纹，应该是模制留下的痕迹；器腹不成正圆或器壁多曲折的器物，如扁壶、折肩罐等，则用手制。晚期陶器的胎壁较薄，火候较高，陶色纯正，是几个显著特点。纹饰中绳纹仍占过半数，篮纹的数量急骤增长，占到四分之一以上。此外，还有少量的方格纹以及弦纹、附加堆纹等。夹砂陶多施绳纹，泥质陶多施篮纹。篮纹的特点是在竖条中又有隐浅而纤细的横条，排列整齐而密集。器类较早、中期丰富。炊器中釜灶和夹砂缸已绝迹，盛行陶鬲。鬲的种类有直口肥足鬲、绳纹或方格纹单把鬲、双鋬鬲、高领鬲等。以直口肥足鬲数量最多，最具特点。斝有圆腹圜底釜形斝和敛口折肩圜底釜形斝两种。新出现的南瓦，上腹多为深腹盆形，有的腹内附有箅架。盛器中以篮纹镂孔圈足罐、深腹盆的数量最多，其次有磨光黑陶折腹盆和簋。镂孔圈足罐大小不等，最大者高达一米，可容粮一、二百斤。折腹盆敞口，上腹斜收，中腹突棱明显，下腹收成小平底，或带双耳，与豫西、豫中地区的双腹盆近似。食器有浅腹薄胎平底盆、碗、豆。豆分喇叭状矮把、粗筒形把和镂孔圈足等三种。饮器中的小杯，造型轻巧，有的底附乳丁状三足。汲水器扁壶，较前粗短矮胖，一侧扁平内凹，一侧圆凸明显，器表多饰篮纹（图一）。

晚期中、小型墓中，尚未发现成组陶器，只是个别小型墓有随葬陶盆的。

(二) 早、中、晚三期的共同特点

关于陶寺遗址早、中、晚期各类遗存的区别，即我们进行分期的标准，已如上述。下面将着重分析早、中、晚三期文化面貌的一致性及其连续性。

在居住遗迹方面，三期都有半地穴式的白灰面房子，室内中部有柱洞、灶坑或略凸出于地面的菌状灶面。早、中期房子的另一共同点，是室内一侧掏有窑洞或小龛。就灰坑和水井的形状、结构看，三期颇为一致，例如早、晚期的大型灰坑都有坡道，圆形水井设置护壁木构等。早期陶窑的材料尚缺，但中、晚期陶窑的形制差别不大。曾在早期灰坑中发现滤过的石灰膏，又曾发现一座晚期烧制石灰的窑，说明石灰这种建筑材料在这里一直得到大量的使用。

埋葬遗迹方面，从早到晚一直使用同一个墓

表二

陶寺遗址碳十四测定年代一览表

实验室 标本号	材料	出土层位或单位号	分期	距今	树轮校正年代	
					距今	公元前
ZK682	木炭	I 区 T101H102	早	4340±90	4825±185	2875±185
ZK1098	木炭	I 区 T1H1:(3B)	早	4010±70	4415±130	2465±130
ZK579	木炭	I 区 T2:(3B)	早	4010±90	4410±140	2460±140
ZK1099	木炭	I 区 T2:(3B)	早	3910±70	4290±130	2340±130
ZK1104	木炭	墓地 H1102:(2)	早	3910±70	4290±130	2340±130
ZK1086	木炭	IV 区 T422:(4D)	中	3740±70	4080±95	2130±95
ZK1150	木炭	IV 区 T420	中	3710±70	4045±95	2095±95
ZK1085	炭化 谷物	IV 区 T423:(4D)	中	3700±70	4030±95	2080±95
ZK1102	木炭	IV 区 H419	中	34900±80	3770±130	1820±130
ZK681	木炭	III 区 H30	晚	3990±80	4390±135	2440±135
ZK1237	木炭	M3231 葬具	晚	3815±70	4170±95	2220±95
ZK1103	木炭	墓地 H1101	晚	3780±70	4130±95	2185±95
ZK1087	木炭	IV 区 H428	晚	3765±70	4110±95	2160±95
ZK1101	木炭	III 区 H303:(8)	晚	3560±70	3955±95	1905±9
ZK1202	木炭	M2068 葬具		3885±70	4260±130	2310±130
ZK1088	人骨	M3141		3640±70	3955±95	2005±95
ZK1089	猪骨	M3141		3370±70	3620±160	1670±160

地;都是土坑竖穴墓,除个别例外,全是成人仰身直肢单人葬,头向也一致,占总数百分之八、九的小型墓,不但随葬品十分匮乏,而且基本上不用陶器随葬等等,都突出地反映出早、中、晚三期葬俗的一致性。

生产工具方面,石斧、铲、锛、刀等几种主要工具,从形态上看,变化不甚明显。“V”字形厨刀,在早、中期墓中都有发现。遗址中独具特征的曲尺形石器,则是早、晚相沿。

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的陶器,随着烧制技术不断进步,器群愈益丰富,器物的造型更趋于坚固、美观、实用。但在数百年漫长的岁月中,某些器物的更迭、消长,仍有规律可循。例如炊器中早期以釜灶为主,中期釜灶、鬲并存,晚期则盛行陶鬲,既表现出演变的阶段性,又含有连续性。一些器物,例如斝、敞口平底盆、折腹盆、小口折肩罐、细把豆、扁壶、小杯等,都是早、晚延续,始终存在,绳纹和篮纹也是如此。器形中以扁壶、折腹盆、折肩罐,纹饰中又以篮纹,早、中、晚演变的轨迹明白可循。

这些事实说明,陶寺遗址的早、中、晚三期,是

同一文化共同体的三个不同发展阶段。

陶寺遗址面积广阔,内涵丰富,在同类型诸遗址中具有典型性。因此,陶寺遗址分期的建立,为龙山文化陶寺类型遗址的编年研究,提供了一个标尺。

二、陶寺遗址的碳十四年代

陶寺遗址的碳十四测定年代,目前已掌握十七个数据,计早期的五个,中期的四个,晚期的五个,期属不详的三个。测定的标本除人骨一例,猪骨一例,碳化谷物一例外,余均为木炭(表二)^⑤。

其中早期灰坑 I 区 T101H102 出土的木炭(ZK682)测得年代为距今 4825±185 年(2875B.C., 树轮校正年代, 下同), 比陕县庙底沟和武功游西庄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址测定的年代^⑥还要早, 显然不合理, 又是孤例, 故可暂不考虑。

早期余下的四个数据,其年代值集中在 4415±130 年(2465B.C.)至 4290±130 年(2340B.C.)